

大象
学术
译丛

[东罗马] 普罗柯比 著

崔艳红 译

陈志强 审校注释

战史

History of Wars

(上)

 大象出版社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我们相关学科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囿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也缺少全面且系统的学术出版,不同学科的读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能够翻译各类专业书籍的译者队伍也日益扩大。为此,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大象学术译丛”,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学术事业:一来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研究途径;二来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来也满足不同学科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大象学术译丛”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者

中文版前言

一

《战史》是普罗柯比完成的一系列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在我们翻译出版了《秘史》后，翻译出版《战史》具有特殊意义。

首先，有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作者在这两部作品中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写作风格和政治立场，其写作时的心态似乎发生了 180 度的巨大转变。同一位作家能够在自己的两部作品中对同一事件给出完全不同的描述和评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现代读者，应该如何对待前人留下的记载，这不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费解的问题吗？

其次，读者还会发现，《战史》平静而生动讲述的故事使作者平和的心态表露无遗，特别是他在娓娓道来中不时给出的评论和通过他人之口所作的演讲，或富有哲理，或充满智慧，对恶劣品性的抨击，对善良人性的褒奖，无不透射出一个伟大作家对人生的理解，反映出那个时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心智。这些在《秘史》中则呈现为扭曲变态的一面，多少误导了我们的读者。可见，保持良好的心态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者，如何看待查士丁尼及其时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战史》的出版能够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东方盛唐来临之前西方文明世界的情况，因为这部书不仅仅记载了波斯战争、汪达尔战争和哥特战争这三件决定那个时代历史进程的大事，而且比较全面地记录了那个时代欧洲地中海世界和西亚的民族风土，使很多几乎被历史沉积湮没无闻的记忆重现在读者眼

前。欧洲一些民族最早的历史线索可能要在他的这部书中寻觅。

《战史》的可读性很强,因为作者秉承了古典历史写作的传统,尤其是在历史事件过程的细节描述中加入了大量富有激情的演说词,其中荡漾的忠勇礼智信等古风对今人不无教育意义。出版《战史》、《秘史》等古典作品中文译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阅读古典作家的著作,以便从这些作品中汲取智慧。

二

读一部史书首先应该了解其作者。这里我们引用一段相关的文字,因为它极为准确地描述了《战史》作者的情况:

“普罗柯比(Procopius,约公元500—约565年)是查士丁尼的同代人,根据史家的考证,他比皇帝小近18岁。也就是说,当查士丁尼于45岁登基正式成为皇帝时,普罗柯比刚刚出道。由于他结识了当时杰出的军事将领贝利撒留而受到重用,才华得以施展。仕途的顺达和才尽其用使他对查士丁尼的雄才大略深感折服。

事实上,普罗柯比如同当时其他拜占廷地方贵族子弟一样,为了获得仕途发展的机会,极力争取进入帝国政府,为此,他接受了系统的贵族文化教育,并按照拜占廷当局的规定全面接受法律学习,在离凯撒里亚不远的著名的贝利图斯(Berytus)法律学校中攻读法学,经过四五年的学习,再进入君士坦丁堡大学深造。系统的教育使天资过人的普罗柯比很快就成了一名辩护律师。特别是他多才多艺,通晓多种西亚语言,并擅长古典风格的写作为他赢得了声名,他的一些习作甚至成为低年级同学的写作蓝本。

527年,青年将军贝利撒留被提升为帝国东部波斯边境达拉要塞的统帅。这个地区长期受到古代叙利亚文化的影响,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官方文件中普遍使用叙利亚语。由于普罗柯比通晓叙利亚语,所以被任命为贝利撒留的秘书兼法律顾问。从此,普罗柯比开始其追随贝利撒留的生涯,而后者也因为其卓越战功权势日隆,此后成为普罗柯比的保护人。533年6月,贝利撒留被

任命为远征军最高统帅，奉命出征北非汪达尔王国。普罗柯比作为其顾问也随军出征，成为这位杰出将领的主要幕僚。由于他渊博的学识得到贝利撒留的倚重，故与之过从甚密，成为其家庭中亲密的成员，甚至参与了他的一些私人事务。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普罗柯比开始打算写一部以贝利撒留为主的历史，以记述查士丁尼发动的恢复帝国梦想的伟大战争，并开始留心记录下他所经历的事件。最初，这一打算并未形成完整的计划，因此，他收集的素材也失于简单，以至他后来在真正动手写作《战史》时，只能简略地描述第一次波斯战争。^{〔1〕}

534年，贝利撒留在取得对汪达尔人的胜利后，将被征服的非洲地区的军事指挥权移交给拜占廷将领所罗门，他本人奉召返回君士坦丁堡，接受皇帝查士丁尼为庆贺其卓越战功举行的盛大凯旋式。当这位声名显赫的将军离开非洲后，普罗柯比继续在非洲留任。在此期间，他目睹了536年初驻扎北非的拜占廷军队因军饷问题发动的兵变，亲身感受到当地柏柏人土著居民袭击拜占廷军队造成的巨大恐慌，这更加深了他对贝利撒留军事才能的佩服。因此不久以后，普罗柯比主动请求离开北非，前往直意大利，再度回到贝利撒留麾下，成为指挥远征意大利的拜占廷军队的统帅贝利撒留的幕僚。535年，贝利撒留受命统领拜占廷远征军前往意大利，首先在西西里岛登陆，挑起了哥特战争。这场战事从535年一直持续到554年，由于哥特人早已经熟悉了拜占廷人的战略战术，因此双方几乎势均力敌，战争进行得异常艰苦。最初，贝利撒留攻陷了亚平宁半岛西南部的那不勒斯，占领了罗马与拉文纳，而后就陷入拉锯战，双方互有胜负。在相持战中，朝廷中出现了不利于贝利撒留的传言，他也因此于540年应召回京。正是在他逗留君士坦丁堡期间，哥特人在极具天赋的国王托提拉领导下，迅速扭转了失败局势。540年，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东部的首府拉文纳陷落，普罗柯比被迫与贝利撒留一同回到首都。544—548年，贝利撒留再次被派往意大利，但他也未能取得重大胜利，甚至还一度

〔1〕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tran. By H. B. Deving, Harvard Univ. Press 1996, I, i, 2-20.

使拜占廷军队遭到惨重伤亡,曾经征服的土地被哥特人悉数收回。罗马城在拜占廷军队与哥特人的拉锯战中已成为一片废墟。552年,查士丁尼再派帝国将军纳尔泽斯增援,使拜占廷远征军取得了最后决定性胜利。而后,拜占廷人继续进兵比利牛斯半岛,进攻西哥特王国。查士丁尼还向西地中海远端派遣海军部队,征服了西地中海上全部岛屿、许多沿海城市与要塞,最终使地中海再次成为帝国的内海。

从此以后,普罗柯比除了奉旨偶尔出访外地或外国,几乎没有离开过君士坦丁堡,因此他目睹了542年发生在京城的大瘟疫。这次瘟疫是地中海世界爆发的第一次鼠疫,其传播速度之快,危害范围之广,病患死亡人数之多,造成的破坏之严重可谓空前绝后。在这次瘟疫中,查士丁尼也未能幸免。

在皇帝患病期间,人们以为他也难逃一死,因此为他准备了后事,还初步确定了皇位继承人。然而,查士丁尼躲过了死神的打击,从大病中逐渐恢复过来。他错误地认为朝野贵族中存在密谋反对自己的阴谋,并进行了大清洗,贝利撒留也被卷入其中。虽然后来的审理证明并无可靠的证据表明贝利撒留涉嫌此事,但因其功高盖主,不久后仍被解除了军事统帅的权力,其部分财产也被没收。作为贝利撒留亲信的普罗柯比也难逃厄运。

当贝利撒留的许多朋友都因利害关系而被禁止或主动中断了与他的联系时,普罗柯比可能还继续保持与这个被冤屈和冷落的帝国功臣的关系。也许正是他对贝利撒留的忠诚阻碍或至少延误了他的仕途发展,他在帝国行政部门再也没有获得升迁的机会了。他中断了在帝国朝廷机构中的生涯,被迫重操旧业,在法庭中作了辩护律师。

在任职律师职业期间,他审理的许多案件涉及中央政府,由此发现了查士丁尼的改革措施对律师职业的不利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帝国朝野事务的深入了解,普罗柯比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其贵族背景使他对查士丁尼的看法由不满转变为厌恶,而后由厌恶变为憎恨。也是在他长期留住京城君士坦丁堡的岁月里,他完成了几部杰出的作品,即《战史》(*History of the Wars*)、《建筑》(*The Buildings of Justinian*)和《秘史》(*Secret History or Anecdota*)。《战史》记述查士丁尼为恢复昔日伟大的罗马帝国疆域而发动的

波斯战争、汪达尔战争和哥特战争,《建筑》颂扬查士丁尼在帝国各地进行的建筑活动,而《秘史》则揭露贝利撒留及其妻子安东尼娜的丑行,抨击皇帝查士丁尼和皇后狄奥多拉的专制统治。其流溢着古典文风的大量散文与书信也流传下来,与其三部名著一起成为后世研究查士丁尼时代历史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资料来源。其优美典雅的文笔使其作品成为拜占廷文学史中的上乘之作。

544年,贝利撒留再度受宠,并被委任为拜占廷军队统帅,第二次出征意大利(544—548年)。大概就是在此期间,普罗柯比对贝利撒留的态度由崇敬逐渐转为鄙视,他认为这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帝国功臣不应该再为查士丁尼效劳,这种鄙视后来转变为敌意。他曾抱怨说,贝利撒留根本没有兑现其对朋友们的诺言,显然这是指他的这位保护人违背诺言失信于普罗柯比的行为。

关于普罗柯比的后期职业生涯,我们缺乏任何确切的史料。但从他的书中,我们还是了解到,普罗柯比后来还获得过“显贵者”(Illustres)的称号,表明他确实拥有过很高的行政职位并成为元老院的成员。也许,脱离了贝利撒留保护的普罗柯比,凭借其出色的写作才能获得了皇帝的青睐,并因此获得了朝廷中的重要职位和贵族称号。

后世史家根据普罗柯比同时代作家的记载了解到,562年曾有一位同名的普罗柯比担任了君士坦丁堡市长。但是,人们难以确定这位身居高位的普罗柯比是否就是那位妙笔生花的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因为,以普罗柯比为名的作品再也没有出现过。或者,同一个普罗柯比因为公务繁忙而无暇写作了也未可知。无论如何,人们至今也无法证实普罗柯比是哪一年去世的。”

三

对于《战史》,英译者序言作了简洁的介绍,我们无需多言,读者应该保持对它阅读前的一些神秘感。

另外,为了读者的方便,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给出一些导读性质的提示,因为要清楚地阅读一部史书,必须具备某些当时人的时空观念,否则作者讲

述的事实在现代人的理解中就失去了坐标。我们应该感谢本书英文译者,他在翻译过程中按照我们的纪元清楚地标注了每个重要年代,随时加入了对这些年代的说明。这些年代的注释是准确可靠的,因为英文翻译者同时也是本书的研究者。但是,关于作者提到的许多空间概念,英文译者没有提供更多的说明,特别是在本书开始的若干部分里,许多地名(包括江河湖海、山川地理)缺乏必要的解释。也许,这些地名对于西方读者并不陌生,但是对于生活在东方文化背景中的读者来说,不提供这些说明就会使初读这部历史巨作的人感到如坠五里云雾。事实上,英文译者在《战史》后面几卷中给出了适当的说明,只是我们的读者不可能从书的后面读起。例如多瑙河在书中称为伊斯特河、亚得利亚海被称为爱奥尼亚海,而“亚得里亚海”则是指南到非洲、西到西西里和意大利、东到希腊和伊庇鲁斯的地中海,普罗柯比的“爱奥尼亚湾”指的就是现在的亚得里亚海,等等。还有一些民族名称如阿拉伯人被称为萨拉森人,法兰克人被称为日耳曼人,而作者信手拈来提到的许多古希腊神话中的人名、事件也是普通中文读者难以了解的,对这些类似的更加具体的名词我们在适当的地方加入了注释,并注明“中译者”字样,而英文译者的注释则尽量保持原样,也未做说明。换言之,没有加注“中译者”字样的注释均为英文译者的原注。同时,中文译者认为英文注释不够完整并加入新内容的则以“(英)中译者”注明。总之,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我们加入了若干页下注释,以便随时解决阅读中的困惑。

最后还要指出,正文中多处出现的括号及其中的文字,大多为普罗柯比本人所加,因为他作为当时著名的作家,在古风流行的时代,刻意模仿古典作家,为了不影响遣词造句讲求合辙押韵以保持文字流畅的特点,使用括号说明未尽之意是可以理解的。英文译者在翻译时只是部分地保留了作者原著中使用的括号,但同时为了正确反映作者原意,也在必要时适当地加入了一些括号。可惜的是,无论英文译者还是中文译者都未能十分贴切地将普氏那种合辙押韵的散文风格翻译出来,因此希腊原文的那种美感也难以表现出来。就此而言,英文和中文译者应该向《伊利亚特》的译者罗念生和王焕生学习,翻译不仅要做到“信”、“达”,还要“雅”。而所谓“雅”,又不仅仅是英文和

中文的通顺流畅,还要真正表现出希腊原文特有的韵律之“雅”。这个世界性的难题还是留给后人解决去吧。敬请读者记住,普罗柯比在当时人眼中并非历史作家,而是修辞家和散文作家,是位才气横溢的文人。

本书是根据哈佛大学出版社 1914 年首次出版、1996 年重印的德温(H. B. Dewing)的希腊文英文对照版翻译而成的。

陈志强

英译者序言

查士丁尼时代(527—565 年在位)的史学巨匠普罗柯比出生于 5 世纪晚期巴勒斯坦的凯撒里亚。其早年生活情况和受教育程度目前尚不清楚,但通过现存史料可以知道,他曾取得律师资格,年轻时便到君士坦丁堡寻求发展,很快受到重用,在 527 年就成为贝利撒留的法律顾问和私人秘书。^{〔1〕}而此时贝利撒留也正逢春风得意,刚刚被提升为将军,是查士丁尼的手下爱将。此后不久,查士丁尼与其舅舅查士丁共治罗马帝国。四个月,查士丁逝世,查士丁尼成为罗马人唯一的皇帝,从此,普罗柯比随同其心目中的英雄贝利撒留一同登上时代舞台,成为这一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和贝利撒留丰功伟绩的记录者。

普罗柯比随同贝利撒留转战于美索不达米亚(527 年)、非洲(533 年)和意大利(536 年)。多种因素结合使普罗柯比成为最适合记述这一时期历史的人:他是贝利撒留的密友,亲身经历了战争,认识当时的许多军队统帅,并能够接触到与之相关的政府机构的公文,再加上他生活的时代经历了重大事件,这些其他史家难以企及的优越条件使他的记载生动、详尽、可靠、极富历史价值。同时,我们应该理解其叙述中的若干不公正立场,因为作为官方史家,普罗柯比必须站在对君士坦丁堡朝廷有利的角度来叙述这段历史,否则很难赢得皇帝的恩宠,因此普罗柯比在著述中时有颠倒黑白、阿谀奉承之处,此为瑕不掩瑜。

普罗柯比的三部著作颇为全面地记述了截至公元 560 年以前的查士丁尼时代的历史,其态度、观点和立场各不相同。他最早的也是最伟大的著作是 8

〔1〕 ξυμβουλος, 普罗柯比:《战史》第 1 卷,第 12 章。他也被称为παρεδρος 或υπογραφευς。

卷本的《战史》，此书并非严格按照编年顺序叙述历史，三大战争均独立成篇。前两卷记述波斯战争，第三、四卷再现了对非洲汪达尔人的战争，第五、六、七卷描写了意大利对哥特人的战争，这七卷书是同时发表的。而作为补充本的第八卷则一直记述到 554 年，总结性概括介绍了帝国不同部分的战况。普罗柯比对战争的分述也有重叠现象，因为当罗马人奋力抵抗波斯入侵者之时，他们同时也在非洲作战。事实上，拜占廷帝国正努力去恢复昔日的疆域，要求蛮族人归还罗马帝国的领土，查士丁尼一心想恢复统一的罗马世界，他耗尽了国家的资源以实现他的梦想，虽然这一梦想很辉煌，但注定要失败，因为大厦坍塌之势已成，纵有回春妙手也难以恢复昔日光荣。

这部历史比它的题目所涵盖的内容要广泛得多，几乎记载了那个时代所有的重大事件。在我们读到许多发生在古罗马帝国边界的蛮族战争的同时，也会了解到诸如市民的尼卡暴动(532)，关于 540 年大瘟疫的发病症状以及当时医学方面的一些详细情况。

在八卷《战史》之后，普罗柯比还写了《秘史》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把自己从敬仰和恐惧中解放了出来，一反其在《战史》中隐匿和虚饰，直舒胸臆，无情地抨击了查士丁尼及皇后狄奥多拉，甚至还包括贝利撒留和他的妻子安东尼娜，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是一部公众和私人的放荡与罪恶、无耻与堕落、阴谋与丑闻的详细记载。很明显，其中有夸张的成分，令人难以相信。但是，这部著作作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审视《战史》的视角。应该说，普罗柯比在叙事过程中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作者尤其直率地把狄奥多拉作为他恶意中伤的牺牲者，记述了其既令人震惊又令人作呕的早年生活。当然我们大可不必信以为真。这样一本书在作者生前是不可能发表的，直至 565 年查士丁尼死后才在世上流传。

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人开始对《秘史》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因为乍一看来，一位以平静的语调记述《战史》和以高度赞扬的笔调撰写《建筑》的作者是不可能写出充满诽谤、诬蔑之词的《秘史》的。

然而，我们逐渐发现，这种怀疑缺乏可靠的证据。现在，我们仍然相信《秘史》是普罗柯比所作。极端痛苦使他的作品充满了诽谤夸张，丧失了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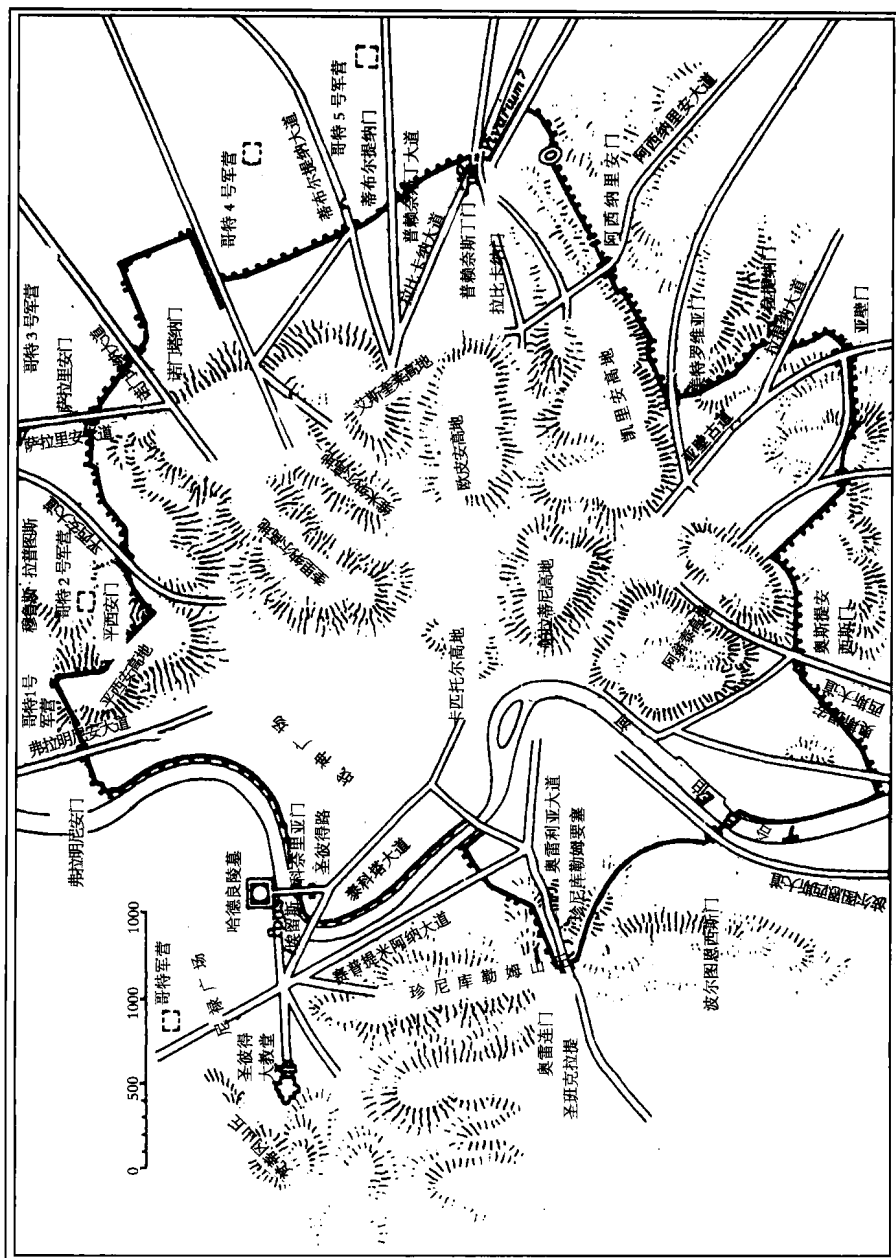
性,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其看成是反对拜占廷宫廷空虚生活的一种进步思想。

第三本著作《建筑》很明显是为迎合查士丁尼而作。我们只能推测其问世的原因:显然,《战史》的发表没有引起查士丁尼的重视,因为其中不但没有赞美皇帝,反而在字里行间流露不满的态度;同时,普罗柯比对其心目中的英雄贝利撒留的赞美也必然招来嫉妒。因此,普罗柯比必须撰写一部歌颂查士丁尼丰功伟绩的作品。《建筑》一书分成6册。普罗柯比在介绍查士丁尼时代帝国各地所有的公共建筑情况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赞美其皇帝。此书文风华丽,辞藻优美,是歌功篇、赞美辞的典型代表。但不幸的是,它得到了当时和以后的拜占廷文学界的极大喜爱,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尽管这部作品缺点十分明显,但其选题恰当,内容丰富,是一部关于帝国内部行政资料的宝库和研究这一时代的最重要的文献。

普罗柯比的写作风格明晰、直率,用简练的语言表达事实真相,不掩恶、不虚美。同时很注重修辞艺术的应用,他尤其喜欢在演讲中引入朗朗上口的习语和格言警句。古典作家的影响在普罗柯比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他尤其喜欢模仿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从他们那里借鉴了许多词语和句子的表达法。但他的希腊语不是纯正的阿提卡方言,许多证据表明他的语言深受当时民间口语的影响。

普罗柯比以一位基督徒的角度和立场写史,但也受当时弥漫在整个社会的希腊古典宗教残余思想的影响。无疑他对古典作家的学习导致了他的这种倾向,这很可能是无意识的,而且对他来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坚信基督教,但同时也模仿修昔底德的话语风格。

本书是根据豪里在1905—1913年发行的托伊布纳(Teubner)丛书编译而成的。



公元6世纪罗马的城墙和城门图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1

英译者序言

1

第 1 卷

波斯战争（上）

1

第 2 卷

波斯战争（下）

58

第 3 卷

汪达尔战争（上）

124

第 4 卷

汪达尔战争（下）

176

第 5 卷

哥特战争（上）

235

第 6 卷

哥特战争（中）

309

第 7 卷

哥特战争（下）

378

第 8 卷

哥特战争（尾声）

467

译后记

555

第1卷

波斯战争(上)

第1章

这部战争史由凯撒里亚的普罗柯比^{〔1〕}所撰,记载了罗马皇帝查士丁尼^{〔2〕}在位期间与东西方蛮族人之间的战争,以及一系列相关史实。倘若史家不将他们记入史册,那么这些重大的事件就会因时光流逝而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普罗柯比认为,记载这些事件会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它既能帮助同时代的人也能后世子孙提供借鉴,说不定后人也会面临同样的困境。当人们准备发动战争或迎敌时,就可以从相似的历史事件中寻求帮助,获知古人在同样的战争中的结局,这样,他们至少就可以尽可能小心谨慎地制定计划,预见当前事件的进程与结果。此外,普罗柯比肯定自己完全有资格撰写这部历史,不为别的,单从他当时恰巧被任命为贝利撒留将军的顾问,从而成为其所属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部书正是上天赋予他的使命。他认定修辞需要睿智,诗歌需要创新,而历史则应当真实。根据这一原则,他准确地记载了历史人物的每一件善行或恶迹,从不文过饰非,即便那是他最亲近的人。

显然,人们一定能从这部书中找到最为重大辉煌的事迹,这些战绩要比其他我们所熟悉的战史更为非凡,只要他们愿意以事实为依据作出评判,而

〔1〕《战史》作者普罗柯比在行文中有时采用第三人称写作可能是为了使读者记住他。——中译者

〔2〕查士丁尼(482/3—565年)是拜占廷帝国皇帝,518年即控制实权,527年登基直至去世。——中译者

不是只以古人为荣，蔑视当今的成就。这类崇古的人把当代士兵说成“弓箭手”，却愿用最高贵的诸如“直接交手的战士”或“持盾牌者”一类的词汇来称呼远古时代的士兵。他们认为，古人的勇猛没能为今人继承——这种观点实在轻率，与事实完全不符。他们从没想过荷马笔下的弓箭手就不幸地因源于他们技艺的称呼^{〔1〕}而受到嘲弄。他们既没配备马匹也没有矛和盾的保护^{〔2〕}。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护体装备；他们步行参加战斗，只能到处躲藏，或者以战友的盾牌为屏蔽^{〔3〕}，或者在小山丘上的墓碑后藏身^{〔4〕}。这样的躲藏在部队溃败时根本无法保护他们，更难以应对突袭之敌。尤其是当他们在空地上参与一场决定性的战斗时，他们还常常偷盗敌对士兵的东西。除了这些之外，这些弓箭手对箭术的练习敷衍了事，拉弓时也只把弓弦拉到胸前^{〔5〕}，他们射出的箭软弱无力，根本不会对敌人造成伤害^{〔6〕}。这是过去弓箭手的表现。现在的弓箭手则大不相同，他们上穿束身甲，下挂护膝甲，头戴护盔，右侧吊箭袋，左侧悬佩刀，有人还随身佩带长矛，在肩部还有不带夹子的护肩，以保护脸部和颈部。他们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骑兵，纵马驰骋时也能准确地射中目标，也可以在追逐敌人或被追逐时射中目标。他们能把弓弦沿着前额拉到右耳的位置，拉满弦时射出的箭有足够的动力杀死敌人，任何铠甲都阻挡不住。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不考虑这些因素的人，他们尊崇古代，不相信现代的改良。即使存在这样的思想，但仍不能阻止我们从最伟大最令人瞩目的战争中涌现出的事迹得出的结论。这些战争的历史始于遥远的古代，讲述的是罗马人和波斯人战争中的幸运、失败和胜利的历史。

〔1〕 见《伊利亚特》第11卷，τοξοτα·λωβητηρ·Κεραιαγλαε·παμβεννπιπα·τοξοτης 在荷马的作品中仅使用了这一次。（“你这个美发自傲的弓箭手、吹牛家、献媚者”，参见罗念生、王焕生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同此）——（英）中译者

〔2〕 见《伊利亚特》第5卷。

〔3〕 见《伊利亚特》第8卷。

〔4〕 见《伊利亚特》第11卷。

〔5〕 见《伊利亚特》第9卷。

〔6〕 见《伊利亚特》第11卷。